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六辑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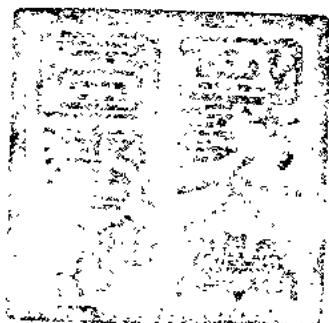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1 9199 4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六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

1995年·北京

XIÀNDÀI GUÓWÀI JINGJIXUE LUNWENXUAN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六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56-5/F·169

1995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50 千

印数 1700 册

印张 6 3/8

定价: 8.50 元

出版说明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选择了国外经济学者论述有关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文章,以期我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务部门对其论点和主张有可能进行研究、评论和借鉴。

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确实需要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加以总结和认真研究,使之趋于完善化。本辑《论文选》中译载的《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宏观经济学的最近发展》这两篇文章,可以使我们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措施的产生和历史演变及其争辩现状有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据前一篇论文的作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的意见,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有好多重要的先驱者,而最重要的恰好就是亚当·斯密。希克斯断言:“尽管我力图表明凯恩斯的学说和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观点可以

做比较，从而得出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但我决不是指它已足够说明我们所谓宏观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对此，希克斯举例说道：“‘价格机制’究竟是什么？人们期望的能通过价格运动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学说，现在已被推翻了。我认为，亚当·斯密没有想到这点，而凯恩斯也未必一定否认它。由于德布鲁的著作，这一问题现在被搁到了最纯粹的理论方面。但在价格运动的有用性方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怀疑它们大多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问题。”当前，我们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但也要切忌走到另一极端，把市场神化了，误认为只靠价格机制就能解决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参看希克斯的上面那段话和其他有关论点，不无启迪。

现在，西方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才把计划与市场看成是不相容的对立物。可是，对于计划与市场两者的混合是任何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这个命题，可以提出有力的论据。”所以，本辑《论文选》中特别译载了《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计划》两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配合的构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不可能设想没有市场机制而存在着一种过得去的和效率高的社会主义；(2)不可能信赖自由放任或对宏观平衡起作用，或在一切领域对微观效率起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马里奥·纽蒂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主张：经济计划应当不多不少地包括宏观变量，如就业，总收入，投资份额及其广泛分配，公共消费和收入分配准则，贸易和资本流量国际收支差额；而市场则应不多不少地包含产量结构(部门的和企业的)和相对价格；与此同时，利用政策工具而不是直接命令来使市场适应计划。在决定了市场和计划的适当范围后，纽蒂进而指出，这种类型的宏观经济计划是与通常的公共政策难以区分的。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教授亚历克·诺夫在《计划与市场》一文中试图构造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他分别对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提出一些设想。在微观经济领域方面，诺夫认为：(1)市场范围应包括大部分的物品和劳务的生产；(2)有外部效应倾向的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以及自然垄断（例如电力生产和分布，电话，城市交通网络等）或者由于有巨大技术的或信息提供的规模经济，都需要有效率地、节约地加以管理，乃至集中的管理和决策，故政府当局（中央的或地方的）对这些方面或部门必须参与计划、评价、定价，或必要的补贴等活动；(3)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包括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在任何类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必须积极资助和扶持，规定免费和负担费用之间的界限。至于宏观经济，诺夫认为，计划工作者必须做的一些重要事情是：(1)注意通货膨胀压力，避免过度需求。(2)就业和失业势必呈现出挑战性问题，因此，反周期措施也许还是需要的；(3)收入政策有必要体现劳动市场压力和避免收入差距过大之间的一种妥协方案；(4)重大投资必须明确地属于中央计划工作者的任务；(5)制定微观经济的“竞赛规则”（包括环境保护，地区发展，管理部门对劳动力的责任心以及控制垄断部门的价格等）。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也就是要处理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问题。纽蒂、诺夫的这两篇文章的一些论点和意见是很有可供参考或借鉴之处的。

本辑《论文选》中所译载的《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向收入政策挑战》三篇文章，对于我们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多少是有参考价值的。例如，吉尔·鲁贝里等在《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一文中认为：“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利益集团在实际资源分配

过程中发生的冲突，而如果单纯依靠工资管理部门或者货币控制系统制订有关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是无法解决这些冲突的”；因此，“应当把反通货膨胀政策与收入分配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这一见解对于我们如何对付通货膨胀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本辑《论文选》译载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构想》是迈克尔·埃尔曼根据英国历届工党政府的经验而进一步构想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工党计划思想的理论基础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费边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所以，此文可供研究参考。

目 录

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	约翰·希克斯 (1)
宏观经济学的最近发展·····	斯坦利·费希尔 (16)
国家与经济·····	特里·卡斯林 (63)
计划与市场·····	亚历克·诺夫 (84)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计划: 范围、手段、制度 ·····	马里奥·纽蒂 (95)
监控社会福利的一种方法·····	罗伊·卡尔-希尔 (110)
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	霍华德·文 (127)
通货膨胀与收入分配 ·····	吉尔·鲁贝里 弗兰克·威尔金森 (150)
向收入政策挑战·····	威廉·布劳恩 (163)
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构想·····	迈克尔·埃尔蒙 (176)

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①

约翰·希克斯

如果把现代宏观经济学规定为从凯恩斯开始,那么,我们对此的意见是应比他 1936 年的《通论》更早。今天,大家都承认他《货币论》(1930 年)中某些内容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但它还缺少宏观经济学完整三部曲的第三部。那就是他的小册子《如何筹措战费》(1940 年)。该书出版于那么重要年代的开端。他要就当时他认为非常暂时性的问题提出建议,因为他并没有考虑战争将会持续多久。因此,在以后的年代,他很少注意这个问题,并不奇怪。不过,我认为,那是个真正的转折点。因为凯恩斯的方法在那里比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表达得更明确。在本篇论文中,我打算对这一方法作些历史的考察。我将说明,他可能有些重要的先驱者,而最重要的恰好就是亚当·斯密。

这种方法在凯恩斯那里是依靠社会账目表,或者是被称作最早的英国官方估算表的《国民收入和支出表》^②。这种《国民收入和支出表》是由米德和斯通在凯恩斯的影响下于同年制作的。这种方法是采用某一特定时期(年份)的社会账目表,来调查造成其状况(该时期)的趋向和政策,并且了解如果这些趋向和政策不同,表上这些数据将如何变化。我认为这就是凯恩斯方法的一般特征;1936 年的就业理论只是一种特殊运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凯恩斯叫作古典,而我们叫作新古典的那些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就会发现他们并未使用上述方法,

而且是有理由的。他们甚至从未有过起初那种初步的国民收入账户。权威性的对英国国民收入的最早估价，是鲍利和斯坦普对1911和1924这两个特定年份所作的估价。马歇尔写他最优秀的著作时，还不可能得到上述任何一种估价。

人们能够解释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也许像英国这样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一直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不能收集（主要是不愿收集）到很多关于宏观数量的情况。因此，如果杰文斯，或者早期的马歇尔曾试图建立一种社会账目表的话，他们也将不会从中得到什么。到20世纪，情况就开始不同了。1893年，一位自由派政治家曾宣称“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但也只是通过商会和调查所得税，开始搜集到足够的资料时，统计学家们才有事可做了。而1914年大战爆发后，信息已是大量的了。

这些情况在另外几个国家也一定出现了，但只能在20世纪，而不是19世纪。

（一）

如果，当我们进一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以前的历史时，可以发现一些特定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下，统计学家可以由之开始工作的材料已经能够得到了。其中之一就是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后的末日判决书。这没引起什么反响并不奇怪。与此有关的却是1650年克伦威尔时代英格兰征服爱尔兰，征服者比被征服者更精于世故，但他们没有某些更近时代殖民者的道德顾忌。他们把爱尔兰看作仅仅是一种可继承的财产，因而便把其所有权瓜分了。他们需要查明被瓜分的财产状况。他们需要爱尔兰的土地状况进行调查。

这是宏观经济学最终由之产生和流传的发端（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光彩的）。作为任务的官方正式调查被委派给了威廉·配第。

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这把他带到了现代科学的开端。^③这样，当调查结束时，他从中发现并提出了许多问题：怎样才能衡量爱尔兰的全部财富？劳动财富和土地财富都要包括在内吗？他的调查材料中没有所得税的资料，工资统计也很少；即便他有这些资料，如要使用，也很不可靠。因为那数据只是他所测量的土地的正常价值（租金价值），就像今天的任何价值一样，同样，工资也只是他需要加以对照的正常工资。怎样才能建立那些正常价值间的关系呢？怎样才能使土地和劳动间建立相等关系，就像他所努力的那样呢？

这在配第那里其实是一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后，由坎蒂隆作出了回答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④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也是唯一同我们有关的部分，他做了社会会计的工作。他清楚地知道在一个封闭经济内（其限定条件十分明确），社会产品等于收入总量；这种相等关系是通过对每个特定产品的要素成本进行估价得出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其他相等关系则不够明确，但其著作中明显地有所暗示。）

坎蒂隆像现代社会会计师一样，把他的经济划分成部门：城市和乡村。这样称呼起来很方便。被认为手工劳动的城市劳动，没有任何协作因素也能生产；乡村劳动，农业劳动没有“谷物”赖以生长的土地就不能生产。这两类劳动都以口粮工资支付。而口粮工资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实际上并不一样。每个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充分的弹性。他认为，“如果不是生存条件的限制，人们的繁殖力就会像谷仓里的老鼠一样大。”，这样，两类劳动工资都被按谷物量固定下来。

城市产品的谷物价值也由此被固定，因为它们等于工人生产出它们所需的谷物工资。但是，乡村劳动的产品就是谷物本身，一单位谷物的价值，按谷物折算，必定还是一单位谷物，没有必要同

乡村劳动者的谷物工资相联系，除非它被耗费掉的全部产品。在坎蒂隆看来，无论如何，这个标准也不应更多，就像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因此，乡村劳动不像城市劳动，它会生产出一个剩余，由地主作为地租所收取。

社会收入的挣得(和分配)是这么多；但花费方面怎样？部门的划分产生了这个问题。从一个部门获取收入的人们并不一定把收入花费在同一部门中；一些被花费在“内部产品”上，一些则花费在从另外部门“进口”的商品上。这些部门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封闭体系。在该体系中，收支必定是平衡的。如果把各部门单独计算（每个部门都是“平衡预算”），那么，每个部门的进出口必定是平衡的。根据这种收支平衡条件征税，这个体系就能“发挥作用”了。

有理由假定乡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来自地主。乡村劳动几乎花费了它得自乡村产品收入的全部，同样，乡村部门中的劳动辅助部门也大约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经济。因此，地租的大部分开支花费在城市产品上，城市产品则为城市提供了出口市场并因而使它能够购买其需要的食品。人们一定能从坎蒂隆那里了解到很多东西。

后来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古怪的学说；但有些条件，不仅是坎蒂隆所处的环境，适合这种学说，在一些非工业化国家，它仍是真实的，那里的政府就是由农业剩余支撑着。其中一部分用于吃饭、穿衣、政府雇员；同时另一部分，在现代非封闭的国民经济条件下，则被卖往国外。此外，这些出口是为了支付进口；因而为政府（其实是为这个国家城市部门中的另一些人）所需要但国内又不能生产的商品，就可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来取得。在这样的条件下，它也是真实的：即，能在合理工资水平上就业人口的大部分，是农业剩余人口。这就是坎蒂隆所说的东西。

(二)

坎蒂隆的著作似乎并不拥有很多读者；但是它在那些最先把自己命名为经济学家的人中间，却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些人在1750年到大革命期间的法国，曾经显耀一时，而后来则成为著名的重农学派。我不必详细讨论他们的著作，但是，他们从值得注意的坎蒂隆模型作出了一种推断。它是刚才说过的方法的继续。

假如地主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增加，那么，城市的输出也需增加。这可以通过城市把它产品的更大部分用于输出，而把更少的部分留给自己消费，得到证实。但它似乎不可能是有用的方式。（不要忘记城市劳动的供给具有充分的弹性，因此，如果它能支配其产品的话，那么，什么也不能阻止它自用产品产量的增加）。

假定城里人愿意用于支付进口的收入部分为 K (K 必须小于 1)。那么，要保持城市部门收支的平衡，

输出的增量 = 输入的增量 = $K \times$ 收入增量

因而

城市收入增量 = $(1/K) \times$ 输出增量，并且 $(1/K)$ 必定大于 1。

这个输出增量将导致一个收入增量，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收支平衡表将表明，一个额外增量是由部分额外收入花费在内部产品上引起的。而这恰好与凯恩斯的乘数情况相同：为何亚当·斯密那里却没有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来看一下。

(三)

通常认为斯密模型和他的先驱者们之间区别的主要方面，就是他不同的部门划分。他也有两个部门，一个生产剩余产品，另一个不生产剩余产品。他的非生产部门是对重农主义的继承，但比重农主义的城市部门有更多的限制。斯密把通常大多数人叫作城

市劳动的部门，称为生产的。

把这看作斯密生活的时代那种更进一步工业化经济的反映，是很吸引人的；但是人们会记得《国富论》是1776年出版的，而为经济史学家所感兴趣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资料，却要晚一些。这样，上述看法就缺乏说服力。我认为，这种变化更重要的原因是远为深刻的。他需要有一个在时间上更为稳定地使用的模型。

如果人们要对两个不同国家的财富进行比较，那么重农主义那样的模型也许是适用的，要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增长感兴趣，它就不适用了。人们可以看到，斯密在他开头论劳动分工那章中，阐述了其主题的大部分内容。他那么重视的专业化，实际上就是在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模型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他头脑里的社会账户肯定是一种时期账户。包含过去和未来的一段时期，并不是被假定为它在静态下运行的那样。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斯密同凯恩斯是一致的。像凯恩斯一样，他对一个时期中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可是，他并不拥有凯恩斯在其所考察的经济的实际账户方面的优势。他不得不按自己的想法为自己建立一个账户。他干得很出色；然而这只是他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他并没意识到自己要为他不需要特意详细说明的那个账户的特征，作出明确的规定。他对此是相当严谨的（或者认为他会相当严谨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时期的长度问题。

凯恩斯肯定认为他的时期是有一定限度的，至少要有足够的长度使不同的决策能有时间显示其某些后果。如果斯密也这样，那就更好了。不过，他已受到当时已很好建立起来的牛顿机械论，以及把时间划分成无穷小区间对运动进行研究这些实践的影响。人们能够看到，起码有时候，他会表明自己正在按这种方式考虑问题。

如果他对一个长度有限的时期进行研究，那么他的时期就要

从过去延续下来的(各种)商品存货开始,而以将来掌握的相似的存货结束。在这一时期所雇用的劳动,按他的意思,如果其产品形成最终存货(或资本),就被认为是生产的。而没有形成最终存货(或资本)的,就被认为是非生产的。但这不是斯密所说的。他把非生产劳动规定为“在直接使用中消耗的”。^⑤这表明,他在考虑一种长度无限小的时期。如果时期长度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一时期雇用的其产品后来在本期内被消费的劳动,也将被看作非生产性的。

(四)

一旦我们允许斯密有一个长度有限的时期,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也能用斯密的方法去解决。这也许可以通过询问下面的问题,即,斯密对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重农主义模型的错误论述的,或者应该论述的准确性如何,来更方便地加以探讨。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静态模型,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几乎一样。它是硬性规定的。其它假定是经验主义的,也许确实,也许不确实。如同我们所看到的,条件可能就在于它们本来的确实性。

按斯密的理解,重农主义模型的唯一生产部门,就是生产谷物的乡村部门。城市部门是非生产部门。如果这部门有个长度有限的时期,则其自然时期就是从上次收获到下次收获的农业年份。它由前一年的谷物存量开始运行。这将是最初的资本。

假定(就像我们对重农主义模型所做过的分析那样)农村劳动力只消费谷物。则最初的资本就有三个作用:

- (1) “养活”农村(生产的)劳动者;
- (2) 直接由地主消费;
- (3) 由城市部门的非生产劳动者消费。

由于不能造成资本存量的增长,后面两者也许被认为是非生

产性消费。

令 K_0 为初始(谷物)资本。 C 是(谷物的)非生产消费。则 $K_0 - C$ 等于能够支付给生产劳动者的(谷物)工资。按重农主义的看法,这会生产出一个剩余,因而现期内谷物的产量,就是, $(K_0 - C)(1 + s)$ 。这形成最终资本存量 (K_1)。因此,该时期资本的增量就是:

$$K_1 - K_0 = sK_0 - C(1 + s).$$

如果没有非生产消费,按剩余产品的全部价值计算,这个时期,资本将增加;如果存在着向非生产消费的“滴漏”,资本增长就会按大于“滴漏”本身的量减少,因为“滴漏”减少了对“生产”的投入。

我认为斯密概括的模型是清晰的。他的初始资本当然远为复杂。它要包括需要更新的固定资本品以及周转中的商品。所有这些都理解得很好,我没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因为它并不影响我要说明的重要之点。斯密的“非生产消费”和“生产消费”将明显地转换为凯恩斯的消费和投资。

然而,遗憾的是,斯密没有把我们替他做的重农主义的尝试坚持到底。他一定是注意到了对于初始(谷物的)资本应作的另外一件事。可能是谷仓里的谷物储藏问题。可能一些变质的谷物进入了最终存货,却不能形成资本增量。它是非生产的,但不是消费。它对增长率的作用也许是零,或小于零。这也很可能是斯密明显遗漏的问题。

他要是注意到这点,就不会那么武断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⑥为此,他常常受到责备。证明斯密经济学结构中的例外应当被允许,是有用的。

我认为,斯密忽略了它,李嘉图也忽略了它。但是我们发现它清楚地反映在第三位古典大师 J. S. 穆勒的著作中。穆勒在几个方面补充了他们的著作。他实际上谈到了充分就业问题;但在他

的头脑中，这是资本的充分就业，而不是劳动的充分就业。他特别论述到，资本存货也许从来就未被充分使用过。交换过程中未售出的存货，可能会停顿下来。

“资本中这种较大比例的经常不能被使用，就是我们为劳动分工所付出的代价。购买的是成本，但代价却相当大。”^⑦

在这篇论文结尾关于上述过程的产生，还有更明确的论述：

“可能并不存在产品或积累的永久性超额量。尽管在同一时间里，承认单独考虑的任何一种物品都有可能有一个暂时的超额量，因而，也许会有商品普遍的超额量，生产过剩的超额量，但这不是最终结果，它只是一种商业信心的需要。”^⑧

“血气冲动”是一种 18 世纪的表达，它在穆勒时代早已不再时髦。但穆勒可能发现使用它还有用处。它的重新被引用则是由凯恩斯开始的。我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大师处发现了它。

（五）

正如我所表明的，从我正在讨论的传统观点看来，19 世纪后期是个“蒙昧时代”；因而，我可以越过它，直接来看凯恩斯。凯恩斯和古典理论大师间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凯恩斯是一种就业和货币理论，而古典理论大师们却保持了货币的独立性。让我们从古典派的观点看看凯恩斯的理论，看看他是怎样引入货币理论的呢？

实际上，他是通过对工资的探讨引入的。凯恩斯的工资是货币工资。由于他关于工资单位的说法，他力图避免别人对他货币工资不变假定的指责。但是，他又假定在小于劳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外在地决定，即不受他讨论的各种变动的影响。这就是说，不管失业高低，工资都不变。因而，其理论阐述者必然采用的